

潘承玉 著

黄山书社

金瓶梅 詞話



责任编辑:宋启发

封面设计:王长丰

封面题签:冯其庸

ISBN 7-80630-376-6



9 787806 303764 >



ISBN7-80630-376-6

I·45 定价:15.00元

金瓶梅新证

● 黄山书社
潘承玉 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金瓶梅新证/潘承玉著. —合肥:黄山书社, 1999. 1

ISBN7-80630-376-6

I. 金… II. 潘… III. 金瓶梅—文学研究 IV. I207.4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1999)第 01731 号

黄山书社出版发行

(合肥市金寨路 381 号)

新华书店经销 安徽省人民印刷厂印刷

开本: 850×1168 1/32 印张: 7.85 字数: 200 千字

1999 年 1 月第 1 版 199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00001-3000 册

定价: 15.00 元

序

严云受

我虽然在大学时代就读过《金瓶梅》，对《金瓶梅》的研究状况也很有兴趣，且先后购置了一些这方面的书籍，然而，我那点对“金学”历史与现状的了解，是很零星，很皮毛的，更没有写过关于《金瓶梅》的文章。潘承玉同志经过刻苦努力，写成《金瓶梅新证》，要我写篇序，我很为之踌躇。但当我读过这本书稿后，却颇得启发，现在，我就写下一点从书中获得的启发，权且作为“序”吧。

《金瓶梅》是部奇书。虽然在50至70年代，见诸报刊的研究文章甚少，但它在文学史家与研究者心目中，一直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。人们给予它的学术关注，毫不亚于任何一部长篇古典名著。因此，十分自然地，在扫荡了“左”的迷雾对学术领域的笼罩后，沉寂多年的“金学”范围，立即就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。研究者对这部奇书展开了多方面、多层次的探讨。眼界大开，勇于争鸣。其中，关于《金瓶梅》的作者的研究，先后出现了好几种新说，都广征博引，条分缕析，洋洋数万言，甚有吸引力。承玉的这部《金瓶梅新证》，也是以作者研究为主旨的。显然，近年来“金”学研究的蓬勃发展，以及《金瓶梅》作者问题研究的一系列成果，为承玉的探讨提供了丰富的滋养，使这位年青的研究者在开始探求工作之际，具有比前人

更为有利的条件;《金瓶梅新证》中征引了大量的“金学”研究论著,便是这一点的明显体现。

《金瓶梅新证》共包含既相互联系,又各能独立成章的论文13篇,除首篇外,都围绕一个基本论点。这个基本论点就是,《金瓶梅》的作者为著名文士徐渭。认为《金瓶梅》出自徐渭之手的见解,当然不是承玉的首倡。早在30年代,英人韦利就提出过。他之所以有这样的看法,乃是出于一个误会。《万历野获编》曾记述:麻城刘廷伯家藏《金瓶梅》全书抄本,是从其妻家徐文贞处抄来,而徐渭字文长,恰为徐文贞的排行弟兄。于是,他就把《金瓶梅》看成徐渭的手笔。其实,文贞乃明相徐阶的谥号,徐阶与徐渭并非兄弟。韦利的论据自然难以立足,其“徐渭说”也一直遭受冷落,数十年来,几乎为人们所遗忘。承玉此次提出徐渭作《金瓶梅》说,当然与韦利不无关系,但结论的得出,却是他深入具体地钻研小说文本和有关资料而形成的。他肯定了韦利的猜测,但抛弃了误会,并且用大量的来自文本的论据,初步构成了“徐渭说”的比较完整的论述体系。也许他的探讨还有不少粗疏之处,对他的见解肯定会有不同的看法,但是,有一点却是不争的事实:为了证明徐渭作《金瓶梅》,承玉对小说文本作了较为细致的分析。我觉得,从方法论的角度考虑,这一途径无疑是可取的,值得称道。

《金瓶梅》的作者问题,可以说是古典小说研究中的“哥德巴赫猜想”。在将近4个世纪的漫长时间里,关于作者问题的探讨,可以分为两个阶段。本世纪70年代以前,先后出

现过“嘉靖间大名士”、“绍兴老儒”、王世贞或王世贞门人、李卓吾、冯惟敏、李渔、徐渭、“集体创作”……等说法。这些论点,或基本上取之于传说,或仅为简单的推究。论者大多或三言两语,或寥寥短章,少有细密、系统的长篇分析、论证。“大名士”、“老儒”的说法更是笼统,比万历丁巳词话本“兰陵笑笑生”的署名,并不更明确一些。不过,这个阶段留下了一些资料、线索,可供后来者思考。如,关于最初抄本的记述,关于写作时间的讨论,都是考证小说作者的重要参考。80年代以来,随着《金瓶梅》研究的空前活跃,作者问题格外引起一些研究者的强烈兴趣,李开先、贾三近、屠隆等说相继提出,有的研究者则续申“王世贞”说。与前一段时期不同的是,提出见解的论者或写出长篇大文,或撰作专著,征引材料丰富,研究的角度也趋向多样化。创作时间、传抄出版过程、作者的方言习惯,以及身世经历、思想性格等,都成为研究者一一考虑的对象。各位研究者的立论尽管不同,但都表现出一个共同的进展,这就是对小说文本的重视。研究者很注意《金瓶梅》的方言运用,某些细节、场面和人物的某种特征,以及作品的思想等。在上述诸方面中,研究者用力的程度常各有偏重,但注重文本,则是共同的倾向。承玉的《金瓶梅新证》最突出的特点,或者说创造,就是进一步推进了这一倾向。其推进,主要表现在:一、例证数量统计的全面、普遍性。要从一部洋洋百回大书中,抽取若干个例证,证明任何一种观点,往往并非难事。不过,如果取出的例证仅属零星存在,那就不能反映事物的整体性,不能成为可靠的论据。承玉深知这种片面引证的危害。他全面钻研文本,当选取例证时,

力求把握整体面貌。为了说明五十三至五十七回为伪作,承玉着重从使用方言词的惯性系统方面展开论述,在举“兄弟”、“弟兄”为例时写道:“对朋友、手足关系的称呼,五十三回以前与五十七回以后,以‘兄弟’相称者,八十六次”,“以‘弟兄’相称者仅六次”,而五十三至五十七则反过来,“只有五十六回应伯爵‘通家兄弟’,语中出现了‘兄弟’一次,其他六次全是‘弟兄’”。他又举“泡茶”为例,指出词话本五十三回以前与五十七回以后,共提到各种“泡茶”“近三十次”如“瓜仁泡茶”、“胡桃松子泡茶”之类,所有这些场合的“泡茶”,都是作为名词而存在的,大多数还有数量词相配。而五十三至五十七回的作者却把“泡茶”当作动词使用。这样的例证分析与统计考察,只有在对文本逐字逐句的研读后,才能获得。蜻蜓点水,是无法取得这样的资料的。而也只有这种全面、普遍的统计,才能把握作者使用方言惯性系统的特征,从而让人相信,五十三回至五十七回确非原作。像这类在全面、仔细研读文本基础上而取得的例证,《新证》中屡见不鲜。

二、承玉从多方面、多角度来钻研小说文本,如《金瓶梅》的地理原型、方言、民俗、风物、食品,《金瓶梅》的佛、道教描写、人物性格、情节逻辑、创作意结果与心态等。这些方面的考察都紧紧围绕徐渭为《金瓶梅》作者这个中心。在各个方面的微观分析中,作者较好地吧文本引证与相关资料有机地融汇,显得材料相当充实。因此,阅读《金瓶梅新证》,我们不仅能清晰地了解作者认同“徐渭说”的依据,同时也加深了对《金瓶梅》文本的体认与思考。无论你是否接受作者的论断,你都不能不被他提出的大量的文本材料和相关资料所吸引,因而觉得颇受启迪。

所以,“徐渭说”虽非承玉之首倡,然而,读完《金瓶梅新证》后,我们自能强烈地感到,正是在这里,“徐渭”说首次得到了较全面的学术论证。从这一点来看,我们可以认为,承玉不仅是“徐渭说”的认同者,而且有所发展,有所创造。至此,“徐渭说”才能成为一种较为完整的见解,在学术园地中争鸣。

在《金瓶梅》作者问题上,研究者们的意见分歧还非常大。今后,还可能出现新的见解。我个人觉得,由于缺乏材料,人们对这一问题的寻求很难找到比较确定的答案。这也许将是一个永远的遗憾。我这样说,并不是贬低作者问题研究的价值与必要性。为了研究小说作者问题,必然会使研究者在文本上下更多的心力。科学的《金瓶梅》作者问题探讨,纵然没有提供出为很多人接受的答案,却能在小说文本研究方面深入地揭示许多重要特质,推进对文本的观照与体验。如《金瓶梅》的创作时间、方言运用、生活素材来源以及审美特征等,都在作者问题研究中得到了不断深入的探求,人们对这些方面的认识也随之日益全面、丰富。所以《金瓶梅》作者问题尽管难以解答,但却魅力永在,历久长新,不断吸引着后来者为它付出心血,为了解答它而进一步钻研小说文本。

《金瓶梅新证》即将面世了,相信它一定能引起广大读者的兴趣与关注。

庐阳守愚斋

1998年11月19日

目 次

序	严云受(1)
---------	--------

《金瓶梅》五十三至五十七回真伪论	(1)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佛、道教描写:有关《金瓶梅》成书时代的新启示	(38)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

小说家之外:《金瓶梅》作者的三重特殊角色	(54)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

民族主义:《金瓶梅》作者的隐微情怀	(68)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

《金瓶梅》地理原型考探	(75)
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

《金瓶梅》中的绍兴酒及其它绍兴风物	(95)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

《金瓶梅》中的绍兴民俗	(112)
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

《金瓶梅》中的绍兴方言	(124)
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

《金瓶梅》抄本考源	(133)
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

“兰陵笑笑生”揭秘	(152)
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

《金瓶梅》文本与徐渭文字相关性比较	(166)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

缘何泄愤为谁冤	(198)
---------------	-------

《金瓶梅》的女性观与徐渭的“崇”疾	(220)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

附一 徐文长传	(227)
---------------	-------

附二 畸谱	(230)
-------------	-------

后记	(237)
----------	-------

《金瓶梅》五十三至 五十七回真伪论

一、问题的提出

众所周知,现存最早的《金瓶梅》传世刻本,万历丁巳序本《新刻金瓶梅词话》,与后出的崇祯本《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》(分别又称十卷本、二十卷本),情节上的较大差异发生在五十三、五十四回。著名金学专家王汝梅先生对此认为:

崇祯本第五十三回和五十四回据万历词话本改写,改动大,与词话本大异小同……崇祯本五十三回与词话本五十三回的大异小同,仍可以看出崇祯本是据词话本改写而来,并不是另有一种假定的词话本为据……词话本五十三至五十四回,与前后文脉络基本贯通,语言风格也较一致。而崇祯本五十三至五十四回,在语言风格上与前后文不相一致,描写粗疏,改写者艺术修养不高……如果沈德符所云“陋儒补以入刻”的话写在崇祯初年,这补入的文字,可能指二十卷本之五十三回至五十四回,而不是指十卷本《金瓶梅词话》。^①

对这一差异,王先生是充分肯定词话本而否定崇祯本,但这个“如果”的假设是根本不存在的。《万历野获编》明明白白写的就是沈德符在万历年间所历所闻之事。该书卷二十五《词曲》部“金瓶梅”条云:

袁中郎《觴政》，以《金瓶梅》配《水浒传》为外典，予恨未得见。丙午遇中郎京邸，问曾有全帙否……又三年，小修上公车，已携有其书，因与借抄挈归。吴友冯犹龙见之惊喜，怂恿书坊，以重价购刻。马仲良时榷吴关，亦劝予应梓人之求，可以疗饥。予曰：“此等书必遂有人板行，但一刻则家传户到，坏人心术。他日阎罗究诘始祸，何辞置对，吾岂以刀锥博泥梨哉。”仲良大以为然，遂固箠之。未几时，而吴中悬之国门矣。然原本实少五十三回至五十七回，遍觅不得，有陋儒补以入刻，无论肤浅鄙俚，时作吴语，即前后亦绝不贯串，一见知其贗作矣。

丙午为万历三十四年，又三年为万历三十七年，马仲良榷吴关，据美国学者马泰来教授考定，在万历四十一年，^①此后不久，《金瓶梅》在吴中刊刻问世。这与词话本的刊刻年代相契合。而且，冯犹龙名含“二龙”，“二龙戏珠”为传统文化一大图腾，戏珠即弄珠，“吴友冯犹龙”与词话本卷首序的署名“东吴弄珠客”亦相关合。可见，沈德符所云“吴中悬之国门”的刻本即为词话本，“原本实少五十三至五十七回”云云，指的也是词话本无疑。

按理说，沈德符作为与作者同代，对作品问世经过比较了解，又借抄、收藏过原作的过录本的学者，他对词话本五十三至五十七整个五回的看法，应该能得到后世研究者的足够重视和体认。奇怪的是，与王汝梅先生的观点相呼应，近年在金学上卓有建树的台湾学者魏子云先生指出：

从这五回的两种刻本的对比来看事实，可以证明沈德符说的这五回是“陋儒补以入刻”的话，并非无因，惜乎此一问题，不在十卷本“新刻金瓶梅词话”身上，却在二十卷本身上……我们看这五回，十卷本上有第五十五回的任医官看病，与第五十四回的结尾重了，“血脉”不连贯了，还有第五十六回的李三、黄四借银，也有重复之处。其他，无不情节周密，文辞细腻，刻描人物之言谈举止与心理情绪也生动鲜活而有情有致，

绝无补写迹象。二十卷本可就不同了……^①

一方面是作者同时代学者的记载,一方面是当代金学专家的论述,二者相距甚远;同时,两位当代金学专家,虽都从崇祯本劣于词话本的前提出发,一个认为“崇祯本是据词话本改写而来,并不是另有一种假定的词话本为据”,一个认为,沈德符“在字里行间的语意上,暗示了二十卷本以前还有十卷本”,^②推论又如此相左。沈德符、王汝梅、魏子云,何者为是?

不难看出,王、魏二先生在理解沈德符的话时,都有意将其所指从词话本扩大到了崇祯本,从这个前提出发,他们将词话本与崇祯本的对应回目加以比较,得出了崇祯本劣于词话本,因而崇祯本才更当得上沈德符“陋儒补以人刻”云云的主观判断。这样一来,作为考虑重点的词话本本身的问题反而被忽略了。

因此,我们要回答上述问题,判断沈德符的话是否合乎词话本实际,需要重新确定这样一个基本的讨论前提,即词话本的问题应该在词话本自身的艺术系统中加以探讨。直言之,词话本五十三至五十七回是否为“陋儒补以人刻”,我们要解决的是,这五回在词话本的整个艺术系统中,与其他各部分协调吗?如果存在不协调,那么,在程度和性质上,是出于一人之手,由艺术风格粗疏造成的轻微的不协调呢,还是出于不同作者之手,由艺术驾驭水平和风格上的悬殊差异导致的严重不协调呢?

实际上,我们要研究这五回在词话本整个艺术系统中的协调性,还面临着一个先决的问题,即:这五回本身各部分协调吗?这五回本身出于一人之手吗?如果这五回本身就存在严重的不协调——这首先就印证了沈德符“陋儒”记载的可信性,我们就应该把它拆分为更小的整体,以便探讨它与词话本整体的协调性以及一些问题。那么,这五回的协调性到底如何呢?或者说——

二、五回是否出于一人之手

第一,从情节构成看,这五回包含了两个各自独立的情节单元。五十三、五十四回为一个情节单元,描写的核心是“病”,从吴月娘望官哥病情开始,到西门庆望李瓶儿病情、安顿李瓶儿吃药结束,以西门庆埋怨“娘儿两个都病了,怎的好”,将两病描写绾结到一起。在这个单元内部,五十三回重点描写西门庆请施灼龟、钱痰火、刘婆子做法事;五十四回重点描写西门庆请任医官看病;两回都穿插写了西门庆到南门外刘太监庄上,五十三回是一人骑马去做客,五十四回则是携友坐船去郊游。五十五、五十六、五十七回为一个情节单元,描写的核心是“东京庆寿”。它从众妻妾摆酒为西门庆饯行开始,写到西门庆在东京庆贺蔡太师寿诞,归家后亲朋送礼、妻妾接风、日日宴席的经过,以五十七回开头西门庆“我前日往西京(应为东京),多亏众亲友们,与咱把个盏儿,今日分付……安排小酒,与众人回答”的话,强调了这三回描写的内在统一性。在这个单元内部,五十五回穿插写了扬州苗员外送哥童给西门庆,五十六回穿插写了西门庆周济常时节,五十七回穿插写了西门庆捐银给永福寺和薛、王二尼姑的情节,作者的兴趣在人物之间的施受关系。这两个情节单元艺术描写的中心与主导的穿插趣味迥然。

第二、从性格刻画看,这两个情节单元对主人公西门庆的把握,在某些方面倾向完全相反。例如,第一情节单元中的西门庆,在经济活动方面,是一个小肚鸡肠、吐吐吞吞的角色。本来,李三、黄四借银子(以高利息为代价),五十一回应伯爵说情时,西门庆已爽快答应等门外徐四铺还了二百五十两,家中再添上二百五十两,凑成五百两借给他们;五十二回陈经济讨了徐家银子来后,西门庆即嘱咐应伯爵通知李三、黄四后日来兑银子。但到五十三回,应伯

爵他们按时到来,西门庆的表现却是:第一步,假装完全忘记此事;第二步,应伯爵加以提醒,又声言手边没有银子,企图瞒过徐家已还来银子的事实;第三步,应伯爵再次加以点破,又说家中实在凑不齐另外二百五十两,少二十两要拿粉段折准;第四步,应伯爵批评他不该变相“搭售”,要履行诺言,最后只好如数搬出银子付给了李三、黄四。这些描写无法与前面的描写,特别是四十五回西门庆在李三、黄四一千五百两本利还没还清,又借给他们一千两的描写相统一。错误在于这一单元的作者,混淆了放高利贷与施舍的区别,忘记了西门庆有官阶作依靠,从来就不怕借债人不还高额本息来。第二情节单元中的西门庆,则是一个乐善好施、慷慨大方、挥金如土的慈善家。五十五回,常时节向西门庆诉说无房住的生活困难,西门庆一口答应帮他解决;五十六回,一开头即宣称“西门庆仗义疏财,救人贫难,人人都是赞叹他的”。果然,当常时节几天之后再次请求周济时,西门庆当即拿出了十二两碎银子,并允诺出钱给他买房子住。五十七回更是痛痛快快,一下就向永福寺长老认捐了五百两,向两个尼姑施舍了三十两。要知那时一个丫环才卖四五两!这些描写说明,这一单元的作者根本就没有理解五十二回之前有关西门庆“撒漫使钱”描写的底蕴。终西门庆一生,只有在对待自己所喜欢所玩弄的女性方面才显得大方。十一回写到,为梳笼李桂姐他花银五十两;二十回,他包占李桂姐的月银是二十两;三十九回,为更方便地与王六儿姘居,他为她另买了一处住房,花了一百二十两;宋惠莲与如意儿,一前一后,受到西门庆宠爱时,“银子成两家带在身边”。除了玩弄女人如此大手大脚,西门庆决没有把银子看得很轻贱,可以任意抛出。三十九回,西门庆在玉皇庙举办了一场盛大的醮事活动,吴道官率百余名道众做了三天三夜法事,事后又送来十余抬斋礼,西门庆才奉上总共不过三十两银子;四十九回,西门庆借永福寺钱行蔡状元,仅以一两银子相谢;五十一回,吴大舅借银修官仓,西门庆只给了二十两,而且六十一回

吴大舅就归还了十两来。六十七回,最可心的朋友应伯爵借银五十两,也要立契约,西门庆还半开玩笑,要应伯爵把小妾春花牵来以抵偿利息。总之,这两个情节单元中的西门庆,在经济活动方面的个性出现了两极背离。

第三、从具体的描写来看,两个情节单元之间存在着包含一系列差异的若干重要雷同情节。第一个醒目的雷同发生在两个情节单元的衔接处。五十四回后半部用二千字的篇幅,描写了任太医给李瓶儿看病,玳安跟随太医回去拿药,直至第二天李瓶儿服药病愈的全过程。五十五回开始又从“任医官看了脉息,到厅上坐下”讲论病因写起,直到任医官回家送将药来。我们无法想象,一个作者会为了衔接的自然,而拙笨到把一个情节接连重复写两遍!从这两处雷同的描写中一些不同的细节及所显示的医学知识来看,描写这两个过程的文字也显然出于不同作者之手。对医生的称呼,五十四回始终是“任太医”,五十五回始终是“任医官”;药的获得,五十四回是玳安拿银子跟任太医去取,五十五回是任医官自己送来;李瓶儿的病状、病因、治疗方法,五十四回是“胃腕作疼”,“胃虚气弱、血少肝经旺”,“要用疏通药,要逐渐吃些丸药养他转来才好”,五十五回是“恶路不净,面带黄色”,“肝腑土虚木旺,虚血妄行”,“只是用些清火止血的药”,简言之,一个是胃疼,经血不足,治疗在于疏通,一个是经血过多、不止,治疗在于抑止,截然相反;对“血虚”的理解,五十四回是血虚即血少,即月经不足,显然不懂医学,五十五回血虚即虚血妄行,符合医学常识。第二个雷同是两个单元中都写到的李三、黄四向西门庆借五百两银子的情节。五十三回,西门庆在应伯爵的催逼下,“请了陈姐夫,先把他讨的徐家廿五包(二百五十两)弹准了,后把自家二百五十两弹明了”,“付于黄四、李三,两人拜谢不已,就告别了”。这显然是对五十一、五十二回写到的二人凭借应伯爵,准备向西门庆借银情节的交待。五十六回,又是应伯爵对西门庆说:“前日哥许下李三、黄四的银子,哥

许他待门外徐四银到手凑放与他罢。”西门庆回答说：“李三、黄四的，我也只得依你了。”紧接着写明拿出徐家所还银二百五十两，自家又凑了二百五十两，兑付给了二人。可见，这也是对五十一、五十二回情节的交待。两处交待重复了，但两处交待描写中主人公西门庆的个性表现不同。第三个雷同是两个单元中都两次写到的陈经济与潘金莲偷情的情节。五十三回，西门庆不在家，潘金莲“踮到卷棚后面，经济三不知走来”，亲热中，陈经济说到，“昨夜孟儿那冤家打开了我每”。同回又写到一次幽会。五十五回，西门庆上东京去了，潘金莲“跑到卷棚下，两个遇着”，亲热中，陈经济抱怨：“自从我和你在屋里，被小玉撞破了去后，如今一向都不得相会。”五十七回又写到一次幽会。这五回之前的五十二回结尾，正是二人被孟玉楼和小玉无意中撞破惊散的情节，可见，五十三回的第一次与五十五回的二人偷情描写，都是对五十二回情节的照应；在这重复的照应中，所写陈经济抱怨的对象与具体偷情经过又不同。

第四，从语言形式来看，两个情节单元中的词曲来源与行文语吻亦各自独立。第一单元中共引曲六支，五十三回两支，五十四回四支，曲词全部出自《太和正音谱》。第二单元共引曲五支，五十五回三支，五十六、五十七回各一支，连同五十五回四首词，研究者至今一首也未找到出处，可能全系作者自撰。从行文语吻看，第一情节单元两回充斥了副词“政（正）”，像这样的句子，“两个小厮政送去时，应伯爵政邀客来”、“伯爵政望着外边，只见常时节走进屋里来，琴童政掇茶出来”，简直俯拾皆是。第二情节单元则没有这个毛病。

综上所述，这五回存在着两个情节单元，它们在艺术描写的中心，穿插的趣味，对主人公性格的把握，行文的语吻及点缀词曲的爱好等方面迥然不同，应该视为出于两个作者之手。这五回中存在着一些表面上雷同，实质上又有一系列差异的情节，且雷同